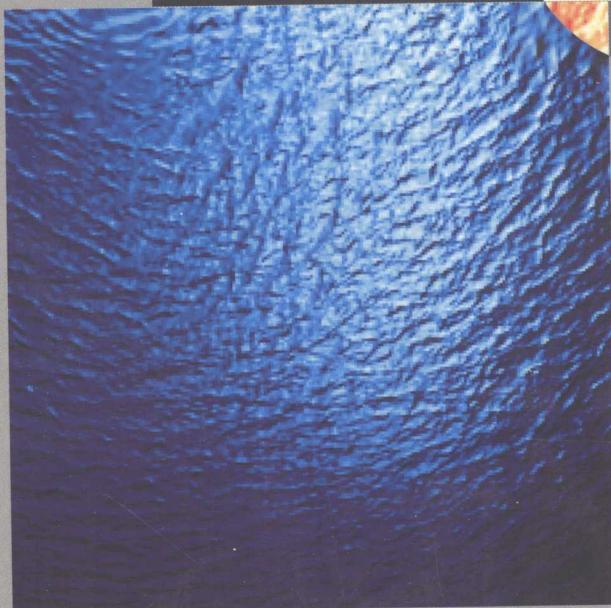


环境政策与法律



叶俊荣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环境政策与法律

叶俊荣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境政策与法律/叶俊荣著.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4
ISBN 7 - 5620 - 0997 - X

I. 环... II. 叶... III. ①环境政策—研究—中国
②环境保护法—研究—中国 IV. D922. 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0094 号

书 名 环境政策与法律
出版人 李传敢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清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本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620 - 0997 - X/D · 947
印 数 0 001 ~ 5 000
定 价 26.00 元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00088
电 话 (010)62229563 (010)62229278 (010)62229803
电子信箱 zf5620@263.net
网 址 <http://www.cup1.edu.cn/cbs/index.htm>

☆☆☆☆☆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发现缺页、倒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谨以本书

献给我的双亲

叶土墙 柯英傅
叶陈彩 柯吴繕

本书出版得到台湾元照出版公司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作者简介

叶俊荣 一九五八年生于台北县板桥市。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法律学研究所毕业后，赴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留学，并获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台大法律学系暨法律学研究所教授。主授宪法、环境法、行政法、法律与经济导论及美国公共专题研究等课程。

其他著作包括“环境行政的正当法律程序”、“第二代环境管制”（英文）、及有关宪法、行政法及环境法等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内容简介

环境议题的崛起，正考验着每一国家的政府与国民，如何在期待技术层面的解决之余，认真思考政策与法律层面的建制。本书从环境权、环境立法、环境刑罚、环境影响评估、民众参与环保以及公害纠纷等方面，广泛探索环境问题的政策与法律背景。除了学理的分析外，本书亦多方引进先进国家的制度与理念，更深入解析五轻设厂与林园事件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环保事件。本书的出版，期提供决策者与关心环境议题的人，一个更有深度的思考空间。

自序

这本书是作者在过去五年来研究环境政策与环境法的一些心得。在过去这五年期间，台湾地区的环境问题层出不穷，“政府”对环境保护的努力也以这段时间最为积极。事实上，不仅是“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在这段期间设立，许多重要的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也都是在这段期间完成建制。相应的，这段期间也是台湾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环境议题就在这高度变迁的时空中，不断受到试炼，也不断调适。由此而形成的环境法，也就因而带有浓厚的动态气息。

正是因为这种高度动态发展的背景因素，在环境法的研究与教学上，我决定暂时压抑法律人较擅长的法律解释与学说介绍的工作，不对空气污染防治法或废弃物清理法等这些个别环境法律，作法条、法理及学说的细步分析。相对的，我投入绝大部分的心力在较具有观念性、体制性与建制性的研究，期待我的研究能与台湾环境议题的演变与制度的发展同步，而非针对已成形的制

度作事后的分析与描绘。正因为如此，不论在研究素材的选择或研究方法的设计上，我都面临不少挑战。许多研究，还必须仰赖长期实证资料的累积，或必须借用经济分析或公共政策的观念或学理，才能顺利达成。正因为如此，读者对于本书，并不适合以“方正”的法律文章看待。在法律理念外，加入一些功能性的体会，对于全书精神与内涵的掌握，将会有所助益。虽然这样的学术论著在台湾的法学界未必很“正统”，但这种研究的取向，却是美国研究行政法、环境法或其他各种管制法的主流。当然，台湾的环境法已逐渐从制度建立期迈入制度运用期，法规范体系逐渐成型后，较微观的细步研究，应逐渐成为第二波研究的重点。

本书所搜集的十篇文章，都是作者陆续于台大法学论丛、法学丛刊、经社法制论丛或“国科会”人文社会科学汇刊等学术性期刊，所登载的学术文章。在内容上广泛地涵盖环境权、环境立法、环境刑法、环境影响评估、环境管制、民众参与、公害纠纷、环境诉讼以及公害输出等问题。除了法律面的思考外，也有政策面的分析，故以环境政策与法律为书名。随着原文刊登时间的流逝，部分资料或有更新的余地。但为忠实反应作者研究的时空条件，除错别字的改正外，仍以原文的形貌呈现。

在出版这本书之际，我要感谢长久对我不懈悉心指导、关怀与鼓励的翁岳生老师。在五年的任教期间，也承蒙杨日然老师、王泽鉴老师、戴东雄老师、李鸿禧老师、廖义男老师、柯泽东老师、黄宗乐老师以及其他许多法学前辈，在教学方法、研究取向以及人生抉择上的鼓励与协助。我的研究伙伴林子仪、许宗力、黄锦堂与简资修等几位老师，更是在日常多次共同教学、研究、与讨论中，不断地激发我的灵感，也不断地砥砺我的意志。我更要借此机会感谢在这五年来，许多既认真又有热情的同学，勇敢地与我在传统法律范畴的边缘，共同摸索开拓。这本论文集的点滴片段，都留有大家的心力与智慧。全书的校稿，劳烦王明礼、雷文政、李立如、张文贞、彭正元、徐志鸿及李慧颖的协助。又各篇文章的摘要，承蒙雷文政与卢柏岑协助制作，均申谢忱。

叶俊荣

一九九三年四月

于台大法学院

目 录

一、宪法位阶的环境权：	
从拥有环境到参与环境决策	(1)
二、“出卖环境权”：	
从五轻设厂的十五亿“回馈基金”谈起	(34)
三、大量环境立法：	
我环境立法的模式、难题及因应方向	(70)
四、环境问题的制度因应：	
刑罚与其他因应措施的比较与选择	(127)
五、环境法上的“期限”：	
行政法院林园判决的微观与巨视	(162)
六、环境影响评估的公共参与：	
法规范的要求与现实的考虑	(186)
七、民众参与环保法令之执行：	
论我引进美国环境法上“公民诉讼”之可行性	(219)
八、我公害纠纷事件的性质与结构分析：	
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〇年	(256)
九、环保自力救济的制度因应：	
“解决纠纷”或“强化参与”？	(297)
十、告知后同意：	
农药输出政策的分析与检讨	(322)

宪法位阶的环境权： 从拥有环境到参与环境决策

摘要

随着台湾这一波环保浪潮的来临，环境权的字眼频频出现，民间要求将环境权列入“宪法”，学界亦为文从不同角度阐扬环境权。环境权受到如此重视，固然是台湾环保意识抬头的表征；然而，论者心目中所谓的环境权究何所指？内容为何？功能何在？性质为何？均未明确交代。

本文试图分析传统环境权理论的崛起背景、理论构成及推论方法，并进而从环境问题相对于其他社会问题的特质着眼，检讨传统环境权理论所以逐渐式微的原因。

本文主张，先进国家有关宪法环境权理论的提倡，有其独特的政治社会背景。然而其以高度法律化、自然法意味、以及绝对式的分析倡议环境权，与环境问题蕴涵高度科技背景、决策风险、以及利益衡量的特质未能相容，而造成“水土不服”，也因而导致理论的色厉内荏，终难顺利推进。本文认为，如果宪法位阶的环境权理论仍有倡行的必要，则应改弦更张，将环境权定性为参与环境决策的程序权，以别于传统享有舒适环境的实体权。如此将能更吻合环境问题的特质，且能汇纳我之社会转型期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程序的张力，达到合理建制与民主参与的目标。

关键词汇：环境权、宪法位阶、利益衡量、政治参与、代表性强化

目 次

I、前言	政管制的缺陷
II、传统环境权理论的内涵	2. 期待法院弥补政治运作的 缺陷
一. 环境权的性质	3. 检讨
1. 宪法位阶	二. 理论本身内在的难题
2. 实体权	1. 利益的认定与衡量
3. 共有权	2. 权利的内涵与界限
4. 不可转让	3. 决策的主体与客体
二. 规范架构与演绎形态	三. 理论的实效性有限
1. 宪法中独立的明文规定	1. 规范的推演与实现
2. 宪法解释的结果	2. 对国家的拘束力有限
3. 宪法以外的规定	3. 对私人的拘束力有限
III、传统环境权理论的崛起背景 及没落	四. 理论与问题性质未能相符
一. 理论崛起的背景	1. 环境问题的特质
1. 民间普遍存有不安全感	2. 传统环境权理论的特质
2. 社会动员力量澎湃	3. 传统环境权理论的“水土 3. 未能充分掌握管制事务的 内涵”
二. 理论的没落	V、传统环境权理论的转型
1. 宪法修改困难	一. 宪法关联的理论基础
2. 法院踌躇不前	二. 环境权理论的转型方向
3. 学者已转移研究方向	1. 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分配 2. 民主理念的强调 3. 政治运作缺失的弥补
IV、传统环境权理论的检讨	VI、建立以参与为本位的环境权 ——代结论
一. 理论背景目的的检讨	
1. 期待法院弥补普通法与行	

I 前 言

在林园事件的刺激下，“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一度拟定公害纠纷的“不可接受条件”，其中包括“要求购买环境权”，并举“污染源支付渔民停止近海捕鱼作业之补偿金”为例。^[1]此外，财团法人新环境基金会董事长柴松林为文呼吁修改“宪法”，以专条规定“环境权为‘国家’应予保障的基本人权”。^[2]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亦曾邀集环保机关、业者代表与学者专家讨论“消费者的第八权——健康的环境”，^[3]学界亦为文从不同角度阐扬环境权。^[4]

环境权受到如此重视，固然是台湾环保意识抬头的表征；然而，论者心目中所谓的环境权究何所指？内容为何？功能何在？性质为何？均未明确交代。环境权的申明与保障在环境保护工作上，是否果真如柴董事长所言，乃“环境立法之根本”，“一切有关环保法律、环保政策之指导理念、立法南针、法理解释、护卫程序等莫不以环境权为基础”？^[5]“宪法”中若无以演绎出环境

[1] 联合报，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四版。

[2] 柴松林，环境权的本质与立法保障，“中央日报”，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日三版。

[3] 座谈会于一九八七年六月五日举行。

[4] 参阅李鸿禧，论环境权之宪法人权意义，收于氏著宪法与人权，台大法学丛书（三十九），页五二九（一九八五年）；邱聪智，公害与环境权，法律评论，四十二卷一期，页五（一九七六年）；骆永家，环境权之理念与运用，中国论坛，二十四卷八期，页十六（一九八七年）；林信和，环境人权的衍生与实践，中国论坛，二十五卷三期，页五十三（一九八七年）；柴松林，前揭文注〔2〕；罗常芬，环境问题与环境权，法律学刊，二十期，页三十七（一九八九年）。

[5] 柴松林，前揭文注〔2〕。

权或加入一环境权条款，是否必然意味环境保护工作的挫败？或如学者所谓将造成“目前我们有关公害立法……均明确而具体规定，生活环境之维护，乃其直接目的”之“公然违宪”？^[6]若环境保护确实应有宪法关联，其内涵应如何？尤其是宪法位阶环境权的提倡在欧美已远不如六七十年代热络，我们在环境意识高涨的今日，究应以何种态度面对一个在创始国已逐渐“过时”的理论？凡此均是人们于“提倡”环境权之际所应面对的实际问题。

在欧美，传统环境权理论的提倡，有其独特的政治社会背景。在对环境问题认识不足的情况下，论者以高度法律化、自然法意味、以及绝对式的分析倡议环境权，与环境问题蕴涵高度科技背景、决策风险、以及利益衡量的特质未能相容，而造成“水土不服”，也因而导致理论的色厉内荏，终难顺利推进。本文试图分析传统环境权理论的崛起背景、理论构成与推论方法，并进而从环境问题相对于其他社会问题的特质着眼，检讨传统环境权理论所以逐渐式微的原因。文末并主张如果环境权理论仍有倡行的必要，则应改弦更张，重新调整环境权的内容与性质，将环境权定性为参与环境决策的程序权，以别于传统享有舒适环境的实体权。如此将能更吻合环境问题的特质，且能汇纳我们社会转型期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程序的张力，达到合理建制与民主参与的目标。

[6] 邱聪智，公害法原理，辅仁大学法学丛书专论类（1），页七十八至七十九，（一九八四年）。

II 传统环境权理论的内涵

所谓传统环境权理论乃相对于本文所谓以参与为本位的环境权而言，本身并不含有先验的落后或前进等价值判断于其中。本文所称的环境权或环境权理论，除特别标明外，均指传统意义而言。

一、环境权的性质

传统环境权理论所谓的环境权不论是名称或内容均是众说纷纭；然而大体而言，却具有以下几项共通的性质：

1. 宪法位阶

主张环境权者虽不以宪法层次为限，但不论具体的立论为何，皆主张所谓环境权应具有宪法位阶。许多学者并从人权的角度立论，将环境权与其他基本人权并列。具有宪法位阶的环境权足以拘束政府各部门的行为，以是，行政机关的作为固不得侵犯环境权，在有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法院若认为法律违反环境权保障的本旨，甚至可宣告该法违宪，其影响可谓既深且巨。

2. 实体权

主张环境权者于对环境权作定义或说明时，固然未必使用统一的语言，但大都不离“享受”、“拥有”、或“支配”环境等字眼。在其眼中，环境权非但具有宪法位阶，且是一财产权性质浓

厚的实体权。^[7]一旦将环境权定性为实体权便引发该权是否排他？权利的具体内容为何？界限何在？何人拥有该权？得否转让？对同一个“环境”得否由不同利益背景或嗜好的多数人，主张不同内容甚至相互冲突的环境权等问题。

3. 共有权

多数主张环境权的论者认为环境权应为全民所共有。此一定性相对于其他宪法上的权利而言，乃一异数。吾人殊难想像宪法所保障的自由权、工作权、或诉讼权乃全民共有之权。细揣此一定性的由来与所谓环境共有的法理有关。依该法理，自然山川、河水、空气等物乃共有之物，不能由个人独享。然而，一旦将某一基本人权定性为全民共有，在某些意义上已将该权架空。其意义何在颇值得玩味。

又若不将环境权的共有范围定为全体人民，而仍坚持共有的理念，则有划定界限的困难。例如核三厂设在南湾，究竟哪一范围的人拥有环境权？附近居民？垦丁游客？屏东县民？或所有台湾地区的居民？核四厂预定设在盐寮，又究竟哪些人有权参与厂址择定的决策，或要求赔（补）偿？

4. 不可转让

具有宪法位阶且具有实体意义的环境权又被定性为不可转让。此一特性或为基本人权特质的衍生，但环境权作为一基本人

[7] 我们介绍环境权的文献中，亦有将宪法上的环境权与私权上的环境权相提并论，认为系“环境权之私权化”，参阅邱聪智，前揭文注〔6〕，页七至九；或认具有宪法基本人权与私法上权利“二种性质”之新权利者，参阅骆永家，前揭文注〔4〕，页十八。然而，所谓私法上的“环境权”，其具体内容的不确定性较诸宪法意义的环境权并不逊色，其判归与内涵应依法律具体认定，或基于效率或正义等价值作个案判断为妥，似不宜扣住宪法作一义式的判归。参见注〔60〕。